

耶路撒冷的“隔都化” 及其影响*

王新中 车效梅

内容提要 “隔都化”是指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的居住区隔离现象。耶路撒冷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集三大宗教、两个民族的复杂关系于一城，加之 1967 年以后以色列在耶路撒冷推行的一系列“犹太化”政策，使耶路撒冷成为一座典型的“隔都化”城市。耶路撒冷不同地区“隔都化”的原因和特点也存在差异。耶路撒冷的“隔都化”对巴以和平进程、耶路撒冷问题的解决、阿犹两个民族在耶路撒冷的关系及耶路撒冷未来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均有不利影响。

关键词 耶路撒冷 隔都化 老城 影响

作者简介 王新中，历史学博士、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临汾 041000）；车效梅，历史学博士、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亚非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临汾 041000）。

“隔都”与“隔都化”

“隔都”一词是意大利语“ghetto”的汉语音译，本意为“铸造厂”，最初是指中世纪意大利威尼斯城的统治者出于歧视、迫害、剥削和监管犹太人的需要，不准他们与本城居民混居在一起，他们只能集中居住在城外的一个铸造厂旁边，从而逐渐形成了与周边地区相对隔离的犹太人聚居区，因此，“铸造厂”（ghetto）便有了“隔离区”和“犹太区”的含义。¹此后，欧洲许多国家纷纷效仿在城中或城外划出专门的犹太人集中居住区，从而形成后来欧洲许多国家特有的犹太人“隔都”——犹太社区。犹太社区一般保留着自己的语言、宗教和习俗，社区内基础设施和生活条件较差，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被排斥在主体民族和主流社会之外，处于一种相对封闭、孤立和隔离的状态。美国学者安德鲁·林德对隔都区下的定义是：“以一个民族群体为主，邻里关系密切，彼此间都沿袭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习惯和道德，与外界发生联系比较少。”^④20 世纪以来，随着跨国移民、国内移民现象的增加和城市化的发展，城市社会学家借用“隔都”一词，把城市中由于种族、宗教和经济等原因引起的某一种族或民族、某一宗教群体、某一阶层人群相对隔离、集中聚居的过程与现象称为“隔都化”（ghettonization），使“隔都”继而有了“少数民族聚居区”和“贫民区”的含义。

“隔都化”与“隔都”的存在对城市一体化、其内部有机联系和平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现在，

*本文系车效梅主持的 2007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球化与中东城市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

¹ 参见 [以色列] 阿巴·埃班著；阎瑞松译：《犹太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年版，第 203 页。

^④ 梁茂信著：《都市化时代——20 世纪美国人口流动与城市社会问题》，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49 页。

“隔都化”已成为城市社会学中描述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居民相对隔离、分类聚居现象的一般概念。它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种病态现象，也是许多国家都在致力解决的“城市病”之一。就以色列而言，阿犹两个民族的长期恩怨、以色列建国的特殊历程和巴以冲突的持续发展，使以色列的许多城市和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某些阿拉伯城市不同程度地出现阿犹两个民族相互隔离、分区居住的现象，而耶路撒冷以其复杂的历史和特殊的地位成为中东乃至世界上最典型的一个“隔都化”城市。

耶路撒冷不同地区的“隔都化”及原因

耶路撒冷拥有 3 000 多年的悠久历史，许多民族和国家都对该地进行过征服和重建，三大宗教都在耶路撒冷留下过痕迹。1948 年以色列建国和第一次中东战争后，耶路撒冷经过 19 年的短暂分裂后于 1967 年被以色列重新“统一”。此后，在原有老城和新城的基础上，以色列又多次扩大耶路撒冷的市辖范围，使其现在成为一个拥有 72 万人口、面积 126.4 平方公里、两个民族同时宣布它为首都的特殊城市。耶路撒冷的“隔都化”既有复杂的历史、宗教、民族和文化背景，又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安全和心理原因。具体到耶路撒冷的不同区，其“隔都化”的原因、特点和程度各有差异。

（一）耶路撒冷老城的“隔都化”

耶路撒冷老城面积仅 0.87 平方公里，却是耶路撒冷城区历史最悠久、宗教与民族关系最为敏感、复杂的地区。不同宗教和不同教派的差异与矛盾是耶路撒冷老城宗教社区“隔都化”的主要原因，也因此具有明显的宗教“隔都”特征。16 世纪以来，老城逐渐形成了以宗教和民族为区分的 4 个宗教社区——阿拉伯区、基督教区、犹太区和亚美尼亚区。阿拉伯区位于老城东北，包括圣寺区、阿拉伯基督徒区和阿拉伯穆斯林区，是老城人口最多（22 858 人）、面积最大（0.44 平方公里，约合 655 亩）的一个区；基督教区位于老城西北，人口 5 020 人，面积 0.18 平方公里，约合 276 亩；亚美尼亚区在老城西南，人口 2 304 人，面积 0.12 平方公里，约合 156 亩，是老城最小的一个区；犹太区位于老城东南，人口 2 306 人，面积 0.13 平方公里，约合 210 亩。¹ 这 4 个宗教社区基本上各自独立，各区都有自己的宗教学校、宗教聚会场所、商店和居住区。由于语言、民族与宗教的差异，其相互间少有交往，处于相互隔离状态，实则是 4 个“隔都”。虽有混居现象，但也基本上是形混而实离。一位研究耶路撒冷的学者对此有如下描述：“每个区都有自己的宗教、自己特有的一种语言或几种语言和自己独特的字母。每个区内部又区分出更小的区域，30 个教派拥挤在各个宗教社区，用至少 15 个国家的语言，7 种不同的字母进行各种宗教活动。各区之间的文化差异比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差别还要大，从一个区到另一个区就好像从一个国家到了另一个国家。各区之间虽近在咫尺，却是相互隔离的世界，且彼此心怀敌意。阿犹两族的紧张关系和互不信任在阿拉伯区与犹太区的关系上也有体现，通常，犹太区的居民极少与阿拉伯区的穆斯林接触和交往，尽量避免从阿拉伯街道经过。”^④ 因此，耶路撒冷老城具有明显的“隔都”特征。

三大宗教内部教派众多，民族成分复杂，语言、文化多样，这种状况加剧了老城内部“隔都化”的程度。如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包括阿拉伯基督徒和非阿拉伯基督徒）大多数居住在老城的基督教区、阿拉伯区和亚美尼亚区，分属 4 个教派的 20 多个小教派。天主教派主要包括希腊天主教派、叙利亚派、马龙派、亚美尼亚派和迦勒底天主教会等；东正教派主要有希腊正教派、罗马尼亚派和俄罗斯正教会等；基督一性论派包括亚美尼亚正教派、科普特派、埃塞俄比亚派和雅各比派（叙利亚一性论派）；新教教派包括英国安立甘派、德国和瑞士路德派、荷兰的改革派及苏格兰的长老派教会

¹ 殷罡主编：《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 年版，第 272 页。

^④ Amos Elon *Jerusalem, City of Mirror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Limited, 1989, pp. 173–174.

等。¹ 这些教派都有各自的宗教社区，彼此间围绕着基督教教义、教产所有权、教会管理权、教徒领导权，积聚了难以化解的矛盾，积怨很深，其后果是老城的基督教各派都自我封闭、隔离在自己的教区内，形成围墙中有围墙（walls within walls）、聚居区中有聚居区（enclaves within enclaves）、隔都中有隔都（ghettos within ghettos）的深度“隔都化”局面。^④ 亚美尼亚人居住的教区就是一个自闭、自养的宗教社区。阿拉伯区、犹太区和耶路撒冷新城也有类似现象。

（二）西耶路撒冷的“隔都化”

19世纪中期以后，在老城周围逐渐形成了耶路撒冷新城。第一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和外约旦分别控制了新城的西区与东区，即西耶路撒冷和东耶路撒冷。西耶路撒冷包括1949年停战分界线以西地区，最初有17.7平方公里，后经5次扩展，面积达53平方公里。根据2005年的统计数据，西耶路撒冷总人口为291 642人，其中犹太人283 832人，占西区总人口的98%，穆斯林3 374人，仅占西区总人口1%强。另有阿拉伯基督徒455人和其他类型居民4 074人。^④ 因此，西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占绝对多数，其“隔都化”也主要表现为犹太人内部不同教派之间、不同类型犹太移民之间和不同阶层犹太人之间的居住区相互隔离。

以色列的犹太人来自世界各地，他们的语言、文化背景复杂，教派传承根深蒂固，教育水平参差不齐。他们在各方面的差别不可能一下消除，时常出现的犹太社区之间的紧张与对立不亚于阿犹两族间的紧张与对立，居住区相互隔离不可避免。有学者统计，现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及其先辈来自世界各地80个以上的国家，他们大多保留着原来所在国家的语言、文化、习惯和传统，许多人仍在属于他们的“民族”犹太会堂（“ethnic” synagogues）参加宗教活动。如专为波兰犹太教徒服务的犹太会堂，其拉比穿的是波兰样式的服装，宗教活动中使用的是波兰语。^⅔ 西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分为正统派、保守派和改革派，各派内部又有更小的派别。如正统派中有普通正统派、极端正统派（haredi）和超极端正统派。改革派中又有温和改革派与极端改革派，这些犹太教教派内部、教派之间，以及它们与世俗犹太人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特别是极端正统派与非正统派和世俗犹太人的关系极为紧张，常常引发暴力。对不坚守犹太安息日规矩和宗教习俗的犹太人，极端正统派信徒和犹太神学院学生只要看到，就会斥责、谩骂他们为叛教者、有罪的和崇拜偶像者，时常砸坏他们的轿车、捣毁他们的商店、烧毁他们的饭店。^⅔ 由于极端正统派与非正统派和世俗犹太人势不两立，不能容忍他们对正统教义和宗教习俗的亵渎与违背，便在西耶路撒冷的中部和北部建立了自己的宗教社区，自愿与外界隔离，极少与外界交往。极端正统派信徒既不工作，不纳税，也不服兵役，完全靠政府救济生活。米谢里姆（Mea Shearim）、拉马特阿龙（Ramat Alon）、哈诺夫（Har Nof）等极端正统派聚居的社区俨然成为犹太人过去在东欧居住的隔都区的翻版和活标本。

西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按其早期移民来源国的不同分为3类：阿什克纳齐人（“Ashkenazim”，“阿什克纳齐”意为“德国”），主要指来自欧洲国家的犹太人及其后裔，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塞法迪人（“Sephardim”，“塞法迪”意为“西班牙”），泛指西班牙和葡萄牙裔犹太人，后散居于地中海沿岸各国，保留着较多东方传统；米兹拉希人（“Mizrahim”，“米兹拉希”意为“东方”），主要指地中海以东的东方各国犹太人，东方文化特色浓厚；阿什克纳齐犹太人大多数是中产阶级，收入高，教育水平高，且常能得到欧美国家犹太组织的资助，生活富裕，主要集居在西耶路撒冷郊区环境优雅的高档社区内。而塞法迪和米兹拉希犹太人大多数属于低收入的蓝领阶层，文化水平低，主要居住在市內各方面条件都较差的社区内，与前者相互隔离，分区居住。尽管有部分塞法迪犹太人上升为中产阶

¹ See Alice L. Eckardt *Jerusalem: City of the Ages*, Bost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7, pp.255-258.

④ See Amos Elon, op cit p. 174.

④ <http://www.Jiis.org.il/imageBank/file/shaton2006/shaton-C1005-2005.pdf>

^⅔ See Amos Elon, op cit p. 176.

^⅔ See *ibid.*, p. 67.

级，成功融入阿什克纳齐犹太人的生活中，但来自西方的阿什克纳齐犹太人长期以来有一种优越感，认为只有他们才代表真正的犹太文化，从心底瞧不起北非和东方犹太人，这种心理隔阂和三者在各方面的差异，使西耶路撒冷出现了典型的犹太人居住区隔离现象。¹

（三）东耶路撒冷的“隔都化”

东耶路撒冷的“隔都化”，主要表现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居住区相互隔离。东耶路撒冷最初只有 2.4 平方公里，经过 3 次扩展，现在面积为 70 平方公里。1967 年以前，东耶路撒冷居民基本上阿拉伯人。1967 年以后，以色列通过在东耶路撒冷建立犹太定居点，不断增加犹太人在东耶路撒冷的数量和比例，以淡化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特征。截至 2005 年，犹太人已在东耶路撒冷建立了 10 多个定居点，人口由 1967 年前的 100 多人增加到 180 457 人，占东耶路撒冷总人口的 42%（阿拉伯人为 229 004，占东耶路撒冷总人口的 54%。另有阿拉伯基督徒 11 854 人，未分类居民 4 205 人）。^④ 东耶路撒冷的“隔都化”是随着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化”而逐渐加深的。在北部，犹太定居点主要有拉蒙特（Ramot）、拉马特希洛莫（Ramot Shlomo）、法国山（French Hill）、皮斯加特泽维（Pisgat Ze'ev）、内维亚阿科夫（Neve Ya'akov）和阿塔罗特（Atarot）；南部犹太定居点主要有吉洛（Gilo）、吉瓦特（Givat）、哈姆图斯（Hamat）、哈霍马（Har Homa）；东部已建和在建的犹太定居点有东塔皮奥特（East Talpiaz）、希尔万（Silwan）、吉德马特锡安（Kiryat Zion）、诺夫锡安（Nof Zion）、马阿里扎迪木（Ma'ale Zayim）、波亚拉克拉克（Burj al-Latifa）、西蒙哈扎迪克（Shimon Hatzadik）等。^⑤ 这些犹太定居点与阿拉伯居民区相互交错，却界限分明，彼此间关系相当紧张，经常发生冲突，许多犹太定居点不得不靠警察保护，才能保证安全和维持正常生活。除了空间上的隔离，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隔离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和社交都是相互分离的。通常，犹太人的电话公司不会发行阿拉伯语电话簿，阿拉伯人的电话公司也只出版无犹太人名字的阿拉伯语电话簿，而这背后反映的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基本上不交往。同一部美国电影，犹太人在犹太电影院观看，阿拉伯人在阿拉伯电影院观看；犹太人只坐由犹太人司机开的属犹太公司的公交车，阿拉伯人也只坐阿拉伯人司机开的属于阿拉伯公司的公交车；犹太人中、小学生在犹太学校上学，阿拉伯人中、小学生在阿拉伯学校上学，只有在大学才有极少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混校读书。^⑥ 这些隔离现象在东、西耶路撒冷司空见惯。因此，以色列虽在 1967 年实现了耶路撒冷地理上、法律上和行政上的统一，但阿犹两族的隔离却无法消除。东耶路撒冷“犹太化”政策的实施只是进一步加剧了两族间的“隔都化”，耶路撒冷实际上是一个统而不一的城市。

（四）耶路撒冷周边地区的“隔都化”

耶路撒冷周边地区主要是指与 1993 年城市边界相邻的东耶路撒冷郊外地区，其北、东和南面的阿拉伯人村镇既与耶路撒冷市区隔离，又被彼此隔离。1967 年，东耶路撒冷的第三次扩张把许多连片的阿拉伯人居住区和村庄部分并入市辖范围，部分划入城市以外地区。郊外与郊区的阿拉伯人居住区首先在行政管理和市政建设上被人为地隔开，其居民的身份和地位也有了区别。郊外的非耶路撒冷市居民要进入耶路撒冷有严格限制和繁杂手续，往往是近在咫尺，却被隔离在城市之外，郊外与郊区的各种联系实际上被隔断。更为严重的是，2002 年以来，以色列出于安全和防止恐怖袭击的需要，开始围绕东耶路撒冷修筑隔离墙、设置检查站，用混凝土高墙把东耶路撒冷城市边界两侧的阿拉伯人居住区隔开。从已建成的隔离墙看，以色列为保护更多的郊外犹太定居点和圈占更多的阿拉伯人土地，许多地方的隔离墙与城市边界并不重合、一致，而是深深嵌入、包围住阿拉伯人的居住区和村

¹ See Alice L. Eckardt, op. cit. pp. 184-194.

^④ See <http://www.jiis.org.il/imageBank/file/shnaton2006/shnaton-C1005-2005>.

^⑤ See <http://www.passia.org/publications/bulletins/Jerusalem-Bulletins-2007-English/Jerusalem-Bulletins-2007-%20pdf/page8-9.pdf>.

^⑥ See Daniel Pipes, *Two Bus Lines to Bethlehem*, <http://www.DanielPipes.org/articles/TwoBusLinesToBethlehem>.

庄，丝毫不考虑其自然的连续性和整体性，致使许多隔离墙与城市边界之间的阿拉伯人居住区及村庄进一步被孤立和隔离。以色列军队根据需要，对东耶路撒冷周边的阿拉伯人居住区和村镇经常实行所谓一般关闭、全面关闭和内部关闭的军管政策，关闭期间禁止阿拉伯人离开自己所在的居住区和村镇，与外界完全隔离。整个东耶路撒冷周边的阿拉伯人只能从有限的几个检查站和通道进入耶路撒冷。¹ 因此，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周边的军事安全政策和关闭制度，使东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的“隔都化”更加严重。另外，东耶路撒冷郊区和郊外都有环绕城市、连接各犹太定居点及西耶路撒冷的公路交通网络，既限制了阿拉伯人居住区的扩大，也起到了孤立、隔离阿拉伯人居住区的作用。

耶路撒冷“隔都化”的影响

（一）加大了耶路撒冷市政管理的难度

耶路撒冷的“隔都化”，使市政当局对耶路撒冷的统一管理困难重重。对于老城，既要考虑不同宗教间的权力平衡，又要顾及不同教派间的利益分配，稍有失误，便会引发各方不满，甚至引起严重后果。老城的“隔都化”使以色列不可能独占老城，对其实行完全控制和统一管理。同时，对老城的管理还要考虑到约旦、巴勒斯坦自治当局及阿拉伯世界对伊斯兰圣地管理权的态度和立场。如何在老城平衡各种宗教势力和世俗国家的关系仍是棘手问题；在西耶路撒冷，犹太教极端正统派实行自我管理，对市政当局的许多世俗化政策不满。而世俗犹太人也非常担忧耶路撒冷的极端宗教化倾向。因此，如何管理、平衡极端犹太教徒和世俗犹太人之间的要求与利益也是令市政当局头疼之事；在东耶路撒冷，由于以色列市政当局推行“犹太化”政策，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区别对待，造成东、西耶路撒冷统而不一，形合而实离，无法形成统一管理。同时，巴勒斯坦自治当局和阿拉伯人始终坚持并争取分享对东耶路撒冷的更多合法权利，这些都会加大以色列市政当局对“统一”的耶路撒冷管理的难度。只要耶路撒冷“隔都化”状态没有实现根本改变，市政当局就始终面临管理此城的两难困境。

（二）加深了阿犹两个民族的隔阂

阿犹两个民族的矛盾持续了百余年，双方结仇积怨很深。耶路撒冷“隔都化”不但不利于化解双方的宿怨，反而会进一步加深双方的不信任、恐惧和仇视，扩大阿犹两族心理和感情上的隔阂。这种心理隔离比空间隔离更长久地影响着两个民族的和解与和平共处。可以预见，即使将来巴以实现了和平，只要“隔都化”现象还存在，阿犹两族的平等、互信就难以实现。当然，也有研究显示，两族隔离分居也会减少双方摩擦，双方社区间的暴力、偷盗和破坏行为比各自社区内部这些行为的发生还要少。但这毕竟是以两个民族的不正常隔离为代价的，并不是解决阿犹两族互不信任、恐惧和对立的根本办法。只有打破隔离状态，实现平等的民族融合，彼此的隔阂才能真正消除。

（三）扩大了阿犹两个民族的差距

耶路撒冷“隔都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色列市政当局在耶路撒冷推行有利于犹太人的政策，以“隔都化”来维护犹太人的优势，限制阿拉伯人的发展机会和能力。具体表现在基础设施、教育、卫生和住宅建设的投入严重失衡，财政资金和社会资源大多用于犹太社区，阿拉伯居民获得的很有限。根据1999年和2000年的数据，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只获得了10%的市政预算，而用于每个犹太人的资金投入为阿拉伯人的6倍。犹太人的收入是阿拉伯人的8倍，但阿拉伯人却要与犹太人承担同样的税负。其他方面的差距也很大，如东耶路撒冷阿拉伯人社区与西耶路撒冷犹太人社区的下水管道分别是76公里和650公里，人行道73公里和700公里，社会福利中心3个和20个，妇幼保健中心5个和32个，公共花园29个和1079个，操场2个和1451个，图书馆4个和9个。阿拉伯学生的

¹ See <http://www.passia.org/publications/bulletins/english-Jerusalem/pages/page11.pdf>

入学率、教室和学校的数量也远低于犹太人。¹ 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大多数不具有以色列国籍，只是持有耶路撒冷居民身份证的居民，属于“二等市民”。东耶路撒冷及周边地区的“隔都化”还隔断了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自治区与耶路撒冷的经济联系，既减少了阿拉伯人的工作机会，影响其收入和生活，也削弱了东耶路撒冷及周边地区未来经济发展的潜力，这又会导致以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各方面的差距仍将存在，并有可能进一步拉大。^④ 因此，“隔都化”是耶路撒冷阿犹两族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四）影响了巴以和平进程

耶路撒冷的最终法律地位及其权利划分是巴以关系中的一个棘手问题，而耶路撒冷“隔都化”使巴以双方在耶路撒冷主权归属、宗教权力及其他具体权利的划分上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以色列为防止在耶路撒冷最终地位谈判中“分割老城”的可能，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就开始对老城实施“马赛克化”（mosaicked），即通过征收和高价购买等手段，鼓励犹太人在阿拉伯区和基督教区购买土地和房产，向犹太区以外渗透，形成像镶嵌马赛克那样复杂的混居局面。^④ 但这种混居并不能带来不同居民的融合，只能使老城更加“隔都化”，造成阿犹两族在老城的权益更加交错重叠、盘根错节的事实，形成以色列所希望的权力划分格局。时至今日，老城的地位及权力划分仍然是耶路撒冷问题中的一个死结。由于巴以双方都坚持把耶路撒冷作为各自的首都，都想获取对耶路撒冷的主权。从目前情况看，巴勒斯坦自治当局建都东耶路撒冷还是可能的，但东耶路撒冷及周边地区“隔都化”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拟议中的巴勒斯坦国建都此地的计划更加渺茫。即使未来能够建都，巴勒斯坦方面在东耶路撒冷的权力也因“隔都化”而支离破碎，发展的空间也极其有限。而这些是在巴以和平进程的谈判中巴勒斯坦方面难以接受的。实际上，这也正是以色列使东耶路撒冷及周边地区“隔都化”的目的所在。

结 语

在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的城市中，只要其居民由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组成，便会不同程度地出现“隔都化”现象，如阿拉伯人住在下拿撒勒，犹太人住在上拿撒勒；阿拉伯人聚居于雅法，犹太人聚居于特拉维夫。海法和拉马拉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虽比邻而居，却相互隔离。耶路撒冷是以色列城市“隔都化”的典型与缩影，这里积聚了阿犹两个民族的历史、冲突和矛盾，各种“隔都化”的原因集中于耶路撒冷一城。耶路撒冷的“隔都化”现状是阿犹两个民族长期复杂博弈的结果，是很难在短期内改变的，它将对巴以和平进程，特别是对耶路撒冷问题的解决及未来耶路撒冷的稳定、和平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巴以双方，特别是以色列政府和耶路撒冷市政当局只有从两个民族的长期和平与长远利益出发，采取有效措施，重建互信，实现融合，彻底打破两个民族在耶路撒冷的孤立与隔离状态，才能使耶路撒冷这座“和平之城”名副其实。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成 红）

¹ Marshall Breger and Ora Ahimeir, *Jerusalem: A City and Its Futur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405–414.

^④ See Nazim Al Jubeh, *The Ghettoization of Arab Jerusalem*, November 2002, 16, *Jerusalem Quarterly*, <http://www.JerusalemQuarterly.org>

^④ 参见殷罡主编：前引书，第 289 页。

China – Angola Oil Co – Operation Risks and the Avoidance Measures

Kang Sheng

pp. 40– 44

With large number of offshore oil discovered, Angol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untry in the oil interest games between world powers. Depending on the growing supply of international oil market, China has diplomatically focused on Angola in order to obtain high – quality oil. Oi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ngola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based on good bilateral relations. However, the spe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in

Angola has also made challenges to the bilateral oil cooperation, and risks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It is of great value for the long term development of China – Angola oil cooperation and for China – Africa diplomatic oil strategic framework, and of profound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avoid oversea oil investment risks and protect its oversea oil interest to probe into the existed major risks and challenges in China – Angola oil cooperation.

The Ghettoization of Jerusalem and Its Impacts

Wang Xinzhong & Che Xiaomei

pp. 50– 55

Ghettoization is used to indicate the phenomenon that a city is isolated for some reasons in its development. In its long historical development, Jerusalem has been the city with three major religions and two ethnic groups inhabited and interacted complicatedly. Furthermore, a series of Israeli Jewish policy were implemented in Jerusalem since 1967, which made Jerusalem a typical

Ghettoized city. There are different causes and features of the Ghettoization in different parts of Jerusalem. The Jerusalem Ghettoization is imposing negative impacts on Israeli – Palestinian peace process, solution of the issues of Jerusalem,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rabian and Jewish ethnic groups and Jerusalem's peac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in future.

Research on African Legal Region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Xu Xinhua & Peng Yanyan

pp. 56– 61

Regionalization of the laws in Africa is a new breakthrough and progress of African law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which has been the internal demands of African regional integration, reasonable choice of African countries under the external pressure of legal globalization and also been the realistic demand of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African legal cultures. The African regional organizations have made regional organizational laws and established regional political and legal institutions, the Organization for the Harmonization of

Business Law in Africa has bee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usiness law in North Africa, the regional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mechanism has been established, legal cooperation at regional level has been conducted in peace – keep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s. While achieving African legal regionalization is meeting difficulties and obstacles such as social obstacles, legal corners and technical issues. The development of African legal regionalization will be slow and gradual.